

族主義、民族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可以取而代之。我們認為，為了對抗美國的知識霸權，今後東亞的知識份子應該在多樣化的區域性（地域性和現場性）基礎上，一起來討論如何創造跟我們的未來密切相關、重視世代繼承的公共知識。通

過這樣的活動，對「九一一」事件後變得日益顯著的、美國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單邊主義，東亞公共哲學應該是可以起到防波堤的作用的。

王前 譯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精神傾向

● 程亞文



馬修·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著，韓敏中譯：《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政治與社會批評》（北京：三聯書店，2002）。

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這位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化論者，是當代美國漢學家艾愷 (Guy Alitto) 筆下的「現代化的反對者」，他的這本作於一個半世紀前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政治與社會批評》，雖年代已久，然而書中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發展所作的文化思考，汪洋自恣，機鋒橫逸，至今讀來仍蕩人心魄，餘味悠長。阿諾德是如何「反現代化」的呢？這自然能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不過，這位文化論者對當時英美文化中宗教精神的觀察研究，卻更引起了我的關注。後者無疑也有着強大的歷史穿透力，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先後發生的陰晦場景下，他的一些論述，幾可視作「歷史的先聲」，仍極富啟示性。

阿諾德這位美國漢學家艾愷筆下的「現代化的反對者」，他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雖寫於一個半世紀之前，但今天讀來仍蕩人心魄。他對當時英美文化中宗教精神的觀察研究，有着強大的歷史穿透力，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先後發生的陰晦場景下，他的一些論述，可視作「歷史的先聲」，仍極富啟示性。

希臘精神代表着智性、理性和反思能力；希伯來精神代表着激情、狂放與行為的虔誠。歐洲文化的歷史，就是這兩種文化精神不停碰撞、彼此取代更迭的歷史。阿諾德認為，實現「文化、人性整體的和諧、全面發展的完美」，就要在希伯來和希臘這兩種文化精神之間尋求均衡。而當時的英美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就在於希伯來精神過於旺盛而希臘精神處處受壓。

一 兩種文化精神

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中，阿諾德延拓了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的思路，把歐洲文化解讀成兩種精神和力量的化合：

那種驅向行動的能量，至高無上的責任感、自我克制和勤奮，得到了最亮的光就勇往直前的熱忱——所有這些都可看成為一種力。那種驅向思想——作為正確行動之基礎的思想——的智慧，那種對於隨着人的發展而形成的、新的變化着的思想組合的敏感，欲徹底弄懂這些思想並作出完美調適的不可遏制的衝動——這些可看成為另一種力。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將這種股力量看成對抗的力量(倒並非其本質使然，而是因為它們在人身上和歷史中呈現出對立)，可將它們看成是瓜分了大千世界的對抗勢力。最顯著最輝煌地展示了這兩種力的兩個民族可以用來為之命名，我們可分別稱之為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世界本應在這兩極之間取得均衡，只是事實上從來不曾做到過。

在阿諾德眼中，希臘精神代表着智性、理性和反思能力，澄澈的頭腦、自由的思維是希臘式的追求，它的主導思想是意識的自發性，強調全面透徹地了解人的職責的由來根據，確保不將黑暗當成了光。希伯來精神強調秩序、規則、既定的道德信條，代表着激情、狂放與行為的虔誠，它的主導是嚴正

的良知，注重順服，力主勤勉地履行職責，看到大的亮光就奮力向前。正如對猶太教的篤信與執着，構成了希伯來民族的根本特性一樣，歐洲文化中的希伯來精神，所塗抹的是宗教的底色。在阿諾德看來，歐洲文化的歷史，就是這兩種文化精神不停碰撞、彼此取代更迭的歷史。在兩千多年前希臘人的文化創造曾經光芒四溢，歐洲因希臘人及其文化的存在才可言歐洲文化；而到公元一世紀前後，基督教的興起最終壓倒了希臘的阿波羅之神，希伯來精神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的支配力量，歐洲人此後是在基督教的大發展中前進；而始於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則是在對基督教的質疑中，又一次迎來了希臘文化的再度輝煌，希臘精神使歐洲人從蒙昧的中世紀得到了解脫。

二 英美社會的清教主義

有希伯來精神的社會是幸福的，自由、繁榮、秩序與道德心、正義感都由此而來，這是阿諾德的觀念；一個希伯來精神取得了絕對地位的社會又是不幸的，價值、信仰的絕對化，是罪惡的重要來源，這也是阿諾德的觀念。在阿諾德的心目中，實現「文化、人性整體的和諧、全面發展的完美」，重要的是在希伯來和希臘這兩種文化精神之間尋求均衡。希伯來精神對上帝的信仰，可以鑄造人類崇高的理想和道德心，而希臘精神的

反省自覺，則可以抑制人類走向衝動與莽撞、消解宗教化後的無知無覺。然而，與他所設想的「理想的文化」相對照，令他遺憾的是，當時的英美社會，文化上所存在的問題，恰恰就在於文化精神失衡，希伯來精神過於旺盛而希臘精神處處受壓。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的興起，無疑是希臘精神的復興，不過，不久之後宗教改革運動的突起，也使歐洲湧起了另一種潮流，那就是清教主義。阿諾德敏銳地觀察到，「要回到基督教初創時期的那種熱忱和真誠」的宗教改革運動，「無疑是文藝復興的希伯來後嗣，是文藝復興那熾烈的激情、而不是其理智的產物」，這種斜刺裏冒出的新教思潮、即被稱作為清教主義的東西，作為支流也深刻影響了歐洲人。歐洲該何去何從？阿諾德發現他的國家是走在了與希臘精神相背離的道路上，「英國人是新教的忠誠子弟，他們對文藝復興的了解主要來自其從屬的次要的一面，即宗教改革運動」，「我們的民族仍然具有強烈的希伯來特性（這正是其力量所在）：自信、堅執、專注。清教精神便是這種傾向性的體現」，「二百年來，人類前進的大潮一直奔向認識自我和世界、看清事物真相、以及意識的自發性；而對我國的大部分人、尤其是社會中堅來說，一絲不苟的嚴厲的道德心成為其主要的衝動。他們在錯誤的時刻將次要當成了主要，以對待次要問題的態度對待頭等大事」，「它大大地左右了我們的歷史進程」。

英國是這樣，作為英國人後裔的美利堅民族又如何呢？阿諾德同樣察識精到：

美國幾乎沒有野蠻人，也不大有群氓，除此以外便和我們一樣。也就是說，國家的大多數都是非利士人；但那裏的非利士人比我們更加活躍，他們沒有野蠻人的壓力和虛假典範，更可以放開手腳，為所欲為了。我們發現，英國非利士人最強壯、最活躍的部分是奉行清教和希伯來精神的中產階級，正是這種希伯來化的傾向使他們離開了文化的全面的發展。同樣，人人知道美國人來自英國中產階級，他們將後者的偏頗也搬到美國去了，只會十分狹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領域和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我指的是，當美國人的精神振奮起來、付諸行動時，他們喚起的一般只是宗教那一面，而且還是狹隘意義上的宗教。社會改革者到摩西或聖保羅那裏找教義，他們根本不知道還能從其他地方得到指引。

美國真的如前總統尼克松 (Richard Nixon) 所說，是「一個上帝管轄下的國家」嗎？最初踏上北美大地、後來成為新起的美利堅民族奠基者的那些人，是從歐洲飄洋過海去的清教徒；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卸任的老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總統曾組織一支軍隊，他鼓舞士兵的口號，「基督教士兵，拿起武器」，就充滿了宗教情感；布什 (George W. Bush) 總統在一年前訪問中國的時候，也對清華大學的學生說，美國人98%都

阿諾德指出，美國人來自英國中產階級，他們將後者的偏頗（希伯來化的傾向）也搬到美國去了，當美國人的精神振奮起來、付諸行動時，他們一般只喚起是宗教那一面，而且還是狹隘意義上的宗教。社會改革者到摩西或聖保羅那裏找教義，他們根本不知道還能從其他地方得到指引。

「文化欣喜地、發自內心地贊譽那高尚宏偉的宗教意識，卻不能將宗教意識當作精神生活的全部」，阿諾德提醒人們注意基於希伯來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給世界帶來的恐怖。沒有反思的道德不是道德。

信教，他無法想像沒有宗教信仰人該怎麼來生活。

三 上帝製造的禍端

在世俗社會的表像下，隱藏着一根宗教神經。雖然十九世紀的美國詩哲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一位被譽為「美國精神」代言人的人，曾大力主張新起的美利堅國家擺脫「舊歐洲」的影響，但從「舊歐洲」跑到北美大地的清教徒及其清教主義，看來的確如阿諾德所說，還是支配了「美國精神」。這一點直到今天還並沒有多大改變。

希伯來精神的過度興盛，對於人類生活來說意味着甚麼呢？新教改革與新教倫理的出現，誕生了韋伯 (Max Weber) 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但與此同時，新興的清教主義——「一股強烈崇尚希伯來精神的力量」，也給人類生活帶來了新的煩惱。阿諾德對此洞若觀火，他說：

清教徒面臨的最大危險，在於自以為掌握了那知會他 *unum necessarium*——不可少的一件事——的標準。至於這條標準究竟是甚麼，知會他的又是甚麼事，他的腦子裏只有很粗糙的線條，但他已十分滿足了，覺得自己甚麼都懂了，從今以後只需幹起來就行了。於是，在自信自滿的危險狀態下，他便放開手腳，讓屬於普遍自我的本能力量大行其道。

美國是一個宗教化國度，我們能如一些論者所說的那樣，簡單地

認為「九一一」事件真是一起「世俗主義與宗教主義」、或者說「世俗社會與宗教社會」的衝突嗎？布什在「九一一」事件後說要對恐怖主義份子發動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五角大樓馬上就把軍事行動的代號定名為「無限正義」——當然後來又取消了，這些下意識的說法與行為，都反映了流淌在美利堅民族內心的希伯來精神和清教主義傳統。對宗教的誠摯，它真如這個年輕的民族所相信的那樣，只是一個好的精神存在嗎？應該讓那些印第安人後裔來作評價。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都是在上帝的名義下進行的，美國白人長久以來認為這也是一種「正義」，但是覺醒了的印第安人後裔現在要求重寫美國史，弱勢者的痛苦和呻吟沒有為正統的美國史教科書所記載，這不僅是不公平，也是美利堅民族的「恥辱」。

沒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憐的，宗教的熱忱是我們得以擺脫恐懼、憂慮、悲傷的重要途徑，是我們從卑微中開拓出的偉大希望之鄉；只有宗教的民族則是不幸的，那由信仰所激發出來的巨大衝力，由於絕對化、不能受到任何懷疑力量的消解，最終只會擊傷我們自身。長久以來，我們所存身的這個世界，也一直在為這兩件事而煩惱着：沒有宗教和過度宗教化。人類社會在這兩個極端無止境地擺動，給我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文化欣喜地、發自內心地贊譽那高尚宏偉的宗教意識，卻不能將宗教意識當作精神生活的全部」，

阿諾德提醒人們注意基於希伯來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給世界帶來的恐怖。沒有反思的道德不是道德，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 這位奧地利經濟學家、自由秩序的主張者，半世紀前言之切切地的一句話，也值得人們好好體味：

必須理解到，現在世界上許多最有害力量的根源往往不是壞人，而是高尚的理想主義者，特別是，那些極權主義殘暴行為與原則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學者們奠定基礎的，他們從來不承認自己種下的惡果。

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海歸者的足跡

● 閻小波



張禮恆：《從西方到東方——伍廷芳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對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大陸型國家來說，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客觀上給海歸派留下了一定的活動空間。但海歸派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所作為，不獨取決於時代所留空間的大小，還要看其能否在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個人與國家之間找到一個交合點。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海歸者不絕於途，他們雖非個個有雄才大略，但均抱入世的精神，為國運、民瘼而奔走呼號，然而在歷史的大舞台上成為悲劇人物的卻不在少數。「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闈，因封閉保守的傳統文化，導致他以「悲劇」收場（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深受外來觀念影響的王韜「在更為廣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海歸者不絕於途，但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所作為，不獨取決於時代所留空間的大小，還要看其能否在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個人與國家之間找到一個交合點。海歸者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大舞台上成為悲劇人物的不在少數，如「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闈，因封閉保守的傳統文化，以「悲劇」收場。